

# 多重压力感知与企业发展预期转变： 基于竞争中性的视角

毛德凤<sup>1</sup> 彭飞<sup>2</sup> 魏升民<sup>3,4</sup>

(1.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2.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4.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55)

**摘要:**发展预期作为企业决策的关键因素,其转弱态势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竞争中性视角,利用202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深入探究了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重压力感知显著抑制了企业发展预期。其中,源于现金流、薪酬支付与税费等生存型压力的抑制效应尤为突出,而核心零部件供应与人才技术支持等发展型压力的影响则不显著。企业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其压力感知呈正相关,且这种压力感知会显著削弱其发展预期,但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能够有效缓解这一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压力感知主要通过加剧企业对发展环境的不公平感知来抑制企业发展预期,而非依靠纾困政策的获取发挥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预期理论的内涵,为理解压力感知的作用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词:**压力感知;发展预期;不公平感知;竞争中性;纾困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6)01-0092-13

## 一、引言

改善企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既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核心关切,也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sup>①</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预期作为影响市场微观主体经济决策的基础性要素,同时也是决定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自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经济贸易格局深度调整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影响下,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转弱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短板,

**收稿日期:**2025-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治理改革赋能县域经济韧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24CJY034)

**作者简介:**毛德凤(1988—),女,安徽含山人,安徽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彭飞(1989—),男,安徽阜阳人,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魏升民(1988—),男,山东费县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

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讨论<sup>[1][2]</sup>。尽管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提升了我国企业的正向发展预期<sup>[3]</sup>,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22年以来,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且2023—2024年连续呈现负增长态势。这表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其面临的经营压力依然严峻<sup>②</sup>。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压力是重塑个体资源预期的关键因素,其通过消耗现有资源、引发认知偏差并激活资源损失螺旋,显著弱化个体对未来资源获取与恢复的积极预期,进而固化资源损失的消极预期<sup>[4]</sup>。企业家的主观压力感知会从个体层面传导至企业层面,既直接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又会进一步塑造企业对未来发展的整体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外部制度环境与企业发展预期之间的关联,较少关注企业家内在压力感知如何影响发展预期。这一研究缺口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当前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正面临日趋复杂的内外部压力,这不仅对企业发展预期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评估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场景。基于此,本文以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深入剖析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且生存型压力的抑制作用尤为突出。企业主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感知会显著加剧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冲击,而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有效对冲压力感知的负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多重压力感知主要通过加剧企业对发展环境的不公平感知来弱化企业发展预期,而直接的纾困政策获取对提振企业发展预期的效果较为有限。

本文存在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首先,拓展了企业压力感知的研究视角与测量框架。与以往研究局限于制度压力或环保压力等单一维度不同,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企业内部经营压力(现金流、税费、社保、债务和工资)和外部环境压力(订单获取、供应链和环保)在内的多维压力感知指标体系。这一创新性的测量框架不仅弥补了现有研究在压力感知测量上的局限,还为企业全面评估内外部压力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其次,拓展了企业发展预期的理论边界,为企业战略决策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区别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外部因素对企业预期的影响,本文创新性地从企业主观感知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多重压力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这一视角也为解释“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背离”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最后,基于竞争中性视角,揭示了“不公平感知”而非“纾困政策获取”在企业压力感知对发展预期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传导作用。研究结论对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调整政策优先顺序、精准施策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具有实践参考意义。

##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一)文献综述

#### 1.与企业压力感知相关的研究

关于压力感知对微观企业行为的探讨,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制度压力与环境压力两个维度。在制度压力方面,已有研究重点考察了企业对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和气候政策等不确定性压力感知的效应。部分研究证实了压力感知的积极作用,如严兵和齐凡发现贸易不确定性感知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研发强度,且这一效果在高科技行业中更为明显<sup>[5]</sup>。刘星等认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强管理层的风险感知,显著提高企业金融投资和绿色投资<sup>[6]</sup>。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的观点,如Chen等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投资之间呈非线性关系<sup>[7]</sup>,Liu和Ma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降低可以显著增强企业研发强度<sup>[8]</sup>,张成思等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实体投资<sup>[9]</sup>。在环境压力方面,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分歧。吴晓波等发现高管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对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up>[10]</sup>。陈志红和李健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感知则能够通过跨界行为提升团队创新水平<sup>[11]</sup>。部分学者还探讨了企业管理者对经营风险以及竞争对手等压力感知的经济后果。张骁和李欣基于105家中小企业调查数据,发现高管感知的全球竞争压力

与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之间呈倒 U 型关系<sup>[12]</sup>。李延喜和刘斌用年报文本测度企业经营风险感知,得出管理者经营风险感知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极端现金流风险<sup>[13]</sup>。李颖明等认为企业压力感知能够推动企业制定高水平污染治理策略<sup>[14]</sup>。综上,现有研究对压力感知的经济后果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其作用方向和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 2. 与企业发展预期相关的研究

发展预期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发展预期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投资、雇佣及出口等行为,还会间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现有研究侧重关注企业发展预期的经济效应,探讨了企业市场预期、财务风险预期及发展预期等企业投资规模及结构的影响效应。一系列研究表明,乐观的市场预期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sup>[15]</sup>,而市场预期差距较大则会明显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概率<sup>[16]</sup>。当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预期和财务风险上升时,企业更倾向于增加金融投资而降低实体投资<sup>[17]</sup>,而企业家的重大风险预期上升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规模,还会进一步恶化企业投资结构<sup>[18]</sup>。近年来部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面临“不愿投”的困境,其根源在于预期转弱和信心不足。针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讨论了货币政策<sup>[19]</sup>、财政透明度<sup>[20]</sup>、政府采购<sup>[21]</sup>、行业环境冲击<sup>[22]</sup>、资本开放市场<sup>[23]</sup>和数字化转型<sup>[24]</sup>等维度。

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方面,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制度、环境、经营或竞争等单一维度,重点考察企业外部压力感知的经济后果,而较少关注多重压力源如何共同作用于企业发展预期;另一方面,鲜有文献系统性地探讨企业多重内外部压力感知对发展预期转变的传导路径。基于此,本文基于发展环境公平性这一竞争中性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压力感知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不同压力源对企业发展预期转变的共同作用,以期为优化企业预期管理、完善政策调控提供实证依据。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压力并非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认知评价活动所产生的主观体验<sup>[25]</sup>。企业作为认知评价的主体,其面临的多重压力涵盖了宏观经济波动、产业政策调整等制度性压力,市场竞争加剧、供应链中断等经营性压力,以及融资成本、人工成本高企等财务性压力,这些压力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环境刺激源。企业家的压力感知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制定与资源配置<sup>[26]</sup>。相应地,企业发展预期是企业家基于当前信息、过往经验和对未来的判断,所形成的一种涵盖市场销售、投资扩张、技术创新及人员雇佣等多个维度的前瞻性认知集合<sup>[2]</sup>。它不仅是企业信心的直接体现,也是驱动企业未来行为的根本动因。本文认为,企业压力感知对其发展预期的影响可能存在如下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机制。

#### 1. 基于不公平感知的抑制效应

企业家对压力来源的负面归因,最终通过强化其对发展环境的不公平感知,抑制企业发展预期。根据归因理论,当个体遭遇挫折或面临系统性困境时,倾向于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内部或外部因素。对于企业而言,当融资难、成本高和市场准入门槛高等问题成为普遍现象时,企业家很可能将其归因于外部制度环境缺陷,而非仅仅反思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在此过程中,外部压力使得营商环境中潜在的非中性因素变得更加突出和难以忍受。本文借鉴竞争中性原则来深入阐释不公平感知的内涵<sup>[27]</sup>。竞争中性原则要求政府为所有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经营运营和政府监管等方面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消除因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或地域差异而产生的系统性优势或劣势。企业家的不公平感知,正是其对现实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与竞争中性理想状态之间差距的体现。因此,这种感知具体可分解为多个维度:一是程序公平感知,即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流程是否透明、一致和可预测;二是分配公平感知,即政府补贴、信贷资源和土地指标等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否公正;三是互动公平感知,即在与监管部门的日常互动中,企业是否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持续的经营压力将促使企业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能够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并确保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是企业进

行长期投资和从事创新活动的基础。当企业家感知到制度环境不公平时,意味着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引发企业对长期投资回报率的质疑,使其倾向于选择短期化、防御性的经营策略,具体表现为压缩研发开支、暂缓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现金持有规模等。由此可见,压力通过激活并强化企业家的不公平感知,加剧其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判断,最终表现为企业发展预期的系统性转弱。

## 2. 基于纾困政策获取的促进效应

企业可以通过获取外部支持来修复甚至提升发展预期。资源依赖理论为该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其所处的环境中获取必要的资源,并会采取策略来管理这种依赖关系<sup>[28]</sup>。当企业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冲击,致使其内生资源难以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刚性需求时,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将明显提升。外部压力是激发企业寻求政策支持的直接驱动力<sup>[22]</sup>。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越大,其对减税降费、财政补贴和融资便利等各类纾困政策的需求就越迫切。而此类政策需求会进一步转化为具体行动,驱动企业主动开展政策研究、筹备申报材料,并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对接,以争取政策支持。因此,多重压力感知与企业寻求政策支持的意见及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该机制能否最终对发展预期产生积极影响,关键在于企业能否有效获取纾困政策支持。纾困政策的成功落地主要通过两大渠道提振企业发展预期。一是直接的财务纾困效应。外部资源的注入可有效缓释企业现金流压力,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短期经营风险敞口。这一过程不仅为企业维持生产经营、稳定就业存量和保留核心技术能力提供了关键缓冲期,更构成了稳固企业发展预期的根本物质基础<sup>[29]</sup>。二是间接的信心传导效应。成功获取纾困政策本身就是政府积极作为、致力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关键信号。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修复因经营压力和不确定性而受损的政企信任关系,还有助于企业家构建对政策环境的稳定预期,进而提升企业家的发展信心。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一组备择研究假说。

假说 1a:企业多重压力感知会通过强化发展环境不公平感知,进而抑制企业发展预期。

假说 1b:企业多重压力感知会通过促进纾困政策获取,进而增进企业发展预期。

## 三、实证设计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 2020 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sup>③</sup>,这一数据是在全国范围内按一定比例(0.05%左右)进行的多阶段抽样,不仅覆盖了企业主信息、企业经营情况、治理结构与内部关系、转型升级与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投资与全球化等重要信息,还涵盖了与企业发展预期、发展环境以及压力来源等密切相关的主观感知信息。这为本文开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本文对 28786 家样本企业的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1)删除企业发展预期、内外部压力感知缺失的企业样本;(2)删除企业年龄、企业主年龄、员工人数等为 0 的企业样本;(3)删除企业负债率、销售收入以及营商环境等变量缺失的企业样本。数据清洗后得到 21061 个有效的企业样本。

###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第一,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发展预期(*expectation*)。借助问卷中的问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关于您企业发展,用三个词表达您的心情(最多选 3 项)”定义,将选项“信心”“机遇”和“希望”三个选项设为 1,其余设为 0。企业发展预期的均值为 0.654,表明 65.4%的受调查民营企业对未来发展持有积极预期。

第二,解释变量为企业多重压力感知(*mulstress*)。借助问卷中的问题“贵企业目前在以下方面的压力感分别是(从 1~5 打分,分数越大表明压力越大)”定义,对“现金流”“纳税”“社保成本”“还贷”“核心零部件”“人才技术支持”“支付员工工资”“获取新的国内订单”“获取新的海外订单”“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和“环保压力”这 11 个类型的压力源分别赋值 1~5,并对其加总取算术平均值,取值越大,表明企业压力感知越明显。企业多重压力感知的均值为 2.937,表明受调查民营企业在技术、人才、融

资和成本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压力感知。

第三,控制变量(*control*)主要包括四类。(1)企业基本特征变量,其中企业规模(*size*)使用净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年龄(*firmage*)使用调查年份与企业注册年份的差值加1进行测度;企业设有党组织(*dzz*)为1,否则为0。(2)企业财务特征变量,其中劳动生产率(*lp*)使用销售收入与员工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表示;负债率(*lev*)根据企业汇报的负债率所在区间赋值,将0~20%(含)设为1,20%~50%(含)设为2,50%~80%(含)设为3,80%以上设为4。(3)企业主身份特征变量,其中企业主的现任政治身份(*political*)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设为1,否则为0;企业主的现任行业身份(*hysf*)为工商联执委设为1,否则为0;企业主是中共党员(*dysf*)设为1,否则为0。(4)企业主基本特征变量,其中企业主教育水平(*edu*)为定类变量,将初中以下、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分别赋值为1~6;企业主年龄(*age*)使用调查年份与企业主出生年份的差值加1进行衡量。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符号	指标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发展预期	<i>expectation</i>	发展预期表现积极为1,消极为0	0.654	0.476	21061
多重压力感知	<i>mulstress</i>	将不同类型压力源赋值1~5,加总取算术平均值,数值越大,压力感知越大	2.937	0.929	21061
企业规模	<i>size</i>	净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6.823	2.745	21061
企业年龄	<i>firmage</i>	调查年份与注册年份的差值加1	13.831	7.518	21061
党组织	<i>dzz</i>	企业设立党支部取1,否则取0	0.378	0.485	21061
劳动生产率	<i>lp</i>	销售收入与员工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	3.195	1.588	21061
负债率	<i>lev</i>	取值1~4,0~20%设为1,20%(含)~50%设为2,50%(含)~80%设为3,80%(含)以上设为4	1.818	0.879	21061
政治身份	<i>political</i>	企业主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1,否则取0	0.237	0.425	21061
行业身份	<i>hysf</i>	企业主为工商联执委取1,否则取0	0.189	0.392	21061
党员身份	<i>dysf</i>	企业主为中共党员取1,否则取0	0.361	0.480	21061
企业主教育	<i>edu</i>	初中以下取1,高中取2,大专取3,本科取4,硕士取5,博士取6	4.175	0.903	21061
企业主年龄	<i>age</i>	调查年份与出生年份的差值加1	43.651	9.915	21061

### (三)模型设定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考察企业多重压力感知对其发展预期的影响,由于企业发展预期为二值变量,故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text{pr}(\text{expectation}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mulstress}_{it} + \text{control}_{it} + \rho_j + \lambda_k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j*表示省份,*k*表示行业, $\rho_j$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lambda_k$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epsilon_{it}$ 为残差项。*control*是控制变量集合。 $\alpha_1$ 是本文最关心的变量系数,预期其符号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企业多重压力感知对其发展预期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

### (四)特征事实

企业多重压力感知与发展预期、不公平感知及纾困政策获取之间呈现一些基本特征。

事实一:多重压力感知与发展预期呈显著负相关。样本中65.4%的企业对未来持积极预期。本文将多重压力感知按四等分分组(低压力组0~25%,中低压力组25%~50%,中高压组50%~75%,高压组75%~100%)后发现,如图1(a)所示,积极预期比例随压力水平上升呈明显递减趋势,初步印证了压力感知越强,发展预期越弱的关联特征。

事实二:企业压力源呈现“生存型压力”高于“发展型压力”的结构特征。如图1(b)所示,问卷中11个压力源的均值显示,企业感受最强的压力集中在短期经营环节,“现金流”“还贷”“社保成

本”“支付员工工资”和“税费”等位居前列；而“核心零部件”和“人才技术支持”等战略性压力感知强度较低。这表明当前困扰民营企业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端和成本端的即期生存压力，而非供给端的发展瓶颈。

事实三：多重压力感知与不公平感知正相关。根据问卷中的问题“您当前最大的担忧和烦恼是什么？”构建不公平感知变量（选择“发展环境不公平”赋值为1，其他为0）。如图1(c)所示，不公平感知比例随压力水平上升而增加，为压力通过强化不公平感知抑制发展预期的机制提供了直接证据。

事实四：多重压力感知与纾困政策获取的关联并不明确。本文以“政府补贴与企业净资产的比值”衡量纾困政策获取的强度。如图1(d)所示，纾困政策获取与压力感知水平之间未呈现稳定正向关联。这表明压力提升未直接转化为更高补贴，压力通过纾困政策提振信心的正向机制可能未充分体现或被其他因素干扰。

综上，企业多重压力感知与企业发展预期负相关，与不公平感知正相关，但与纾困政策获取无明显关联。这说明负面制度评价的抑制效应可能强于政策支持的促进效应，为本文构建双重机制分析框架并识别两类效应的相对强度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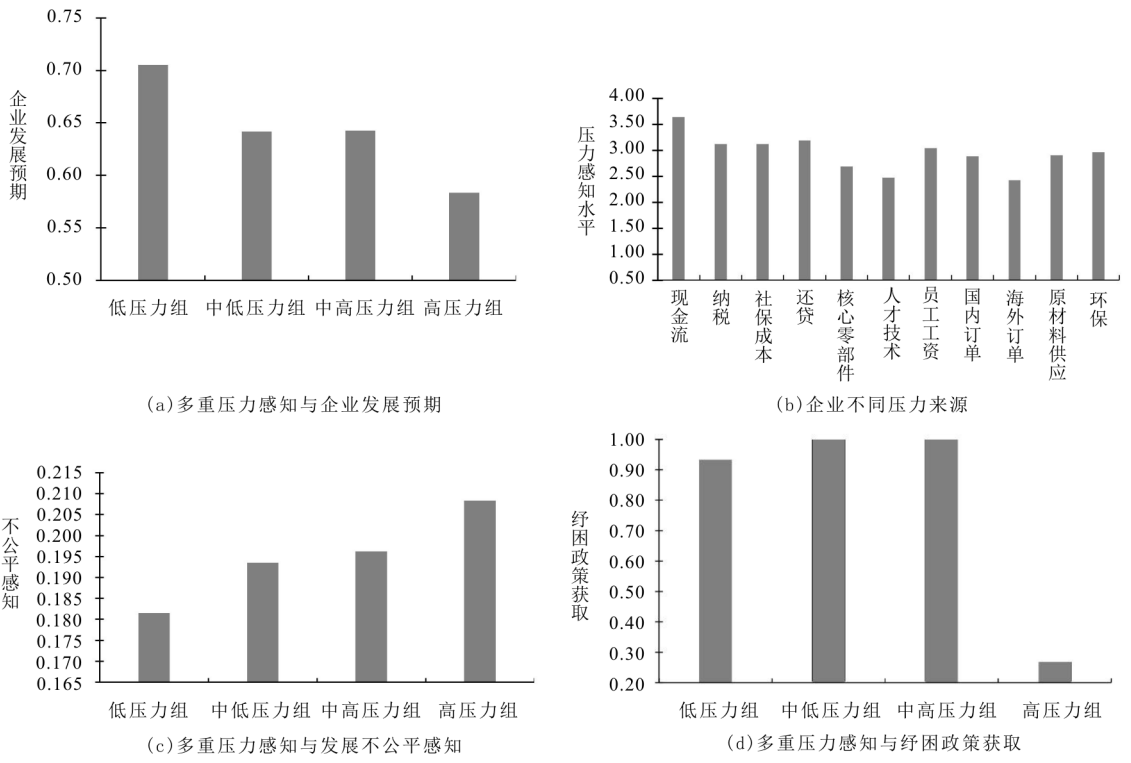


图1 典型特征事实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模型(1)实证检验了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多重压力感知越强，企业发展预期越消极。第(2)(3)列分别纳入企业基本特征变量和财务特征变量，企业多重压力感知系数仍显著为负。第(4)(5)列分别纳入企业主身份特征和企业主基本特征变量，企业多重压力感知的估计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边际效应来看，第(5)列的边际系数为-0.0389，表明企业多重压力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发展预期的积极程度会减少3.89%。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多重压力感知显著降低了企业发展预期。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多重压力感知	-0.119*** (0.014)	-0.116*** (0.014)	-0.109*** (0.013)	-0.108*** (0.013)	-0.108*** (0.013)
企业规模		0.024*** (0.004)	0.019*** (0.004)	0.018*** (0.004)	0.017*** (0.004)
企业年龄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党组织		0.110*** (0.021)	0.114*** (0.020)	0.115*** (0.020)	0.113*** (0.020)
劳动生产率			0.032*** (0.010)	0.031*** (0.010)	0.031*** (0.010)
负债率			-0.067*** (0.012)	-0.068*** (0.012)	-0.070*** (0.012)
政治身份				0.092*** (0.025)	0.073*** (0.025)
行业身份				-0.008 (0.039)	-0.020 (0.040)
党员身份				-0.015 (0.025)	-0.028 (0.027)
企业主教育					0.031*** (0.009)
企业主年龄					0.003*** (0.001)
常数项	0.955*** (0.047)	0.766*** (0.059)	0.792*** (0.064)	0.778*** (0.066)	0.529*** (0.086)
伪 R <sup>2</sup>	0.012	0.015	0.017	0.018	0.019
边际效应	-0.0432*** (0.005)	-0.0422*** (0.005)	-0.0395*** (0.005)	-0.0391*** (0.005)	-0.0389*** (0.005)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061	21061	21061	21061	21061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份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 (二)企业发展预期的效应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将问卷中的11个压力源划分为两大维度。其一,生存型压力。此类压力直接关联企业的日常运营、财务健康和短期存续能力,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的必要条件。具体包括“现金流”“纳税”“社保成本”“还贷”“支付员工工资”“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和“环保压力”,其共同特点是高频、刚性且紧迫。其二,发展型压力。此类压力更多关乎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技术壁垒突破和战略性成长,决定企业未来的升级潜力。具体包括技术能力维度的“核心零部件”与“人才技术支持”,以及市场拓展维度的“获取新的国内订单”与“获取新的海外订单”。表3展示了两大类型压力源的结构差异。第(1)~(7)列分别对应以上七项生存型压力源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其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对企业发展预期抑制作用最强的是“现金流”压力,其边际效应高达-0.038。紧随其后的是“支付员工工资”(-0.034)、“纳税”(-0.029)、“社保成本”(-0.028)、“还贷”(-0.027)、“环保压力”(-0.023)和“原材料供应不稳定”(-0.019)。第(8)~(11)列对应四项发展型压力源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结果。其中,市场拓展维度压力感知的系数显著为负,而技术能力维度压力感知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生存型压力是制约企业家信心的关键因素,而以“核心零部件”与“人才技术支持”为代表的发展型压力因素并非企业发展预期下行的主因。

这一发现揭示了三个关键事实。第一,企业经营需求存在清晰的层次结构。当企业深陷现金流保障、税费缴纳和员工维系等底层生存需求时,对技术创新、人才升级等高阶发展需求的压力感

知则可能被低估。提供城镇就业、贡献税收的普通企业,其首要困境是现金流和成本负担,而非核心零部件或人才技术。第二,构成我国经济主体、提供绝大多数城镇就业和贡献巨额税收的,正是这些技术路径并不尖端的传统普通企业。它们是经济社会的“稳定器”和“毛细血管”,但其真实需求在主流政策导向中尚未得到充分回应。第三,当前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未来政策设计既要着眼长远战略目标,更需兼顾企业当下现实困境。只有夯实企业的生存基础,产业升级蓝图才能真正落地。

表 3 不同压力源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

Part A	(1)	(2)	(3)	(4)	(5)	(6)	(7)
	现金流	纳税	社保成本	还贷	支付员工工资	原材料供应不稳定	环保压力
生存型压力源	-0.107*** (0.010)	-0.080*** (0.009)	-0.076*** (0.008)	-0.075*** (0.008)	-0.094*** (0.007)	-0.053*** (0.009)	-0.063*** (0.009)
边际效应	-0.038*** (0.004)	-0.029*** (0.003)	-0.028*** (0.003)	-0.027*** (0.003)	-0.034*** (0.002)	-0.019*** (0.003)	-0.023*** (0.003)
Part B	(8)	(9)	(10)	(11)			
	核心零部件	人才技术支持	获取新的国内订单	获取新的海外订单			
发展型压力源	-0.014 (0.009)	0.011 (0.009)	-0.057*** (0.008)	-0.011* (0.007)			
边际效应	-0.005 (0.003)	0.004 (0.003)	-0.021*** (0.003)	-0.004* (0.002)			

### (三)异质性分析

#### 1. 企业主地位感知

民营企业对“自身地位”的感知具有高度敏感性,其中企业主地位感知是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和社会责任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企业发展预期的重要变量<sup>[30]</sup>。本文以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同周围其他社会人士相比,您认为当前自己在下列三种社会阶梯上处在什么位置?”度量企业主地位感知,分别将选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应的位置排名赋值1~10,并对其进行逆向处理。处理后取值越高,说明企业主地位感知越强烈。本文通过在回归中引入“企业主地位感知×多重压力感知”交互项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 4 第(1)(2)列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而第(3)列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企业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越高,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效应越显著,而政治地位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企业家会面临更高的社会期望和个人压力,企业运营和发展也会受到更多关注。这种外部环境变化可能给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其发展预期。相

表 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主地位感知的视角

变量	(1)	(2)	(3)
经济地位×多重压力感知	-0.009** (0.004)		
社会地位×多重压力感知		-0.009** (0.004)	
政治地位×多重压力感知			-0.005 (0.004)
伪 R <sup>2</sup>	0.019	0.019	0.01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060	21060	21060

比之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越高,越能够为民营企业发展争取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优势。例如,孙明和吕鹏研究表明,高政治地位的企业家能够提前洞察市场变化和政策动向,并对经济体制改革表现出更强的信心<sup>[31]</sup>。这些优势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并积极应对市场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多重压力感知对发展预期的不利影响。因此,随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企业主往往面临更为严格的社会监督和更高的责任预期。这种“地位溢价”会加剧多重压力感知对发展预期的负面影响,形成“地位—压力”的反馈强化机制。相比之下,政治地位则通过提供政策支持、信息优势和资源获取等渠道,有效缓解了这一不利影响。

## 2. 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政策支持、公平的市场准入和透明的法规环境,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sup>[32]</sup>。本文根据调查问卷中“行政审批手续更加方便、简捷”的程度度量营商环境,将选项“明显改善”和“有所改善”设为1,其余设为0,同时以问卷中“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和“企业从民间渠道筹资的难易程度”分别度量国有银行贷款、民间渠道筹资,同上分别设置虚拟变量,作为营商环境的辅助指标,并引入“营商环境×多重压力感知”“国有银行贷款×多重压力感知”“民间渠道筹资×多重压力感知”等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

表5第(1)列“营商环境×多重压力感知”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弱化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作用,可能是因为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外部不确定性,提高企业发展活力,进而增强企业面向未来的发展信心。第(2)(3)列“国有银行贷款×多重压力感知”“民间渠道筹资×多重压力感知”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国有银行贷款与民间渠道筹资

表5 异质性分析:基于营商环境的视角

变量	(1)	(2)	(3)
营商环境×多重压力感知	0.061* (0.031)		
国有银行贷款×多重压力感知		0.065*** (0.021)	
民间渠道筹资×多重压力感知			0.074*** (0.020)
伪R <sup>2</sup>	0.029	0.031	0.0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061	21061	21061

的改善都显著弱化了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不利影响。原因可能是,国有银行贷款难易程度的改善能够增加民营企业融资的可得性,扩宽其正规融资渠道,而民间渠道的优化则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形成多层次融资体系。融资环境的整体改善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风险抵御能力,改善经营绩效,增强投资信心,进而弱化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效应。

### (四) 机制检验

上文理论分析提出了压力传导至发展预期的两种可能路径:一是基于不公平感知的抑制效应(假说1a),二是基于纾困政策获取的促进效应(假说1b)。本文将对这两条作用路径展开实证检验,以厘清在压力感知影响企业发展预期的过程中,哪类效应发挥主导作用。

表6报告了机制检验结果。一方面,本文检验不公平感知的抑制效应。第一,压力是否会加剧企业对发展环境的不公平感知。第(1)列以问卷中“发展环境不公平”衡量不公平感知,回归结果显示,多重压力感知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承受更大压力的企业,确实更倾向于认为发展环境不公平。第二,不公平感知是否会抑制企业发展预期。第(2)列以“企业发展预期”为被解释变量,将“不公平感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更强的不公平感抑制了企业发展预期。基于此,假说1a得到验证。

另一方面,本文检验纾困政策获取的促进效应。第一,压力能否有效转化为纾困政策的获取。第(3)列以获得政府补贴与企业净资产的比值衡量“纾困政策获取”,结果显示,多重压力感知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二,获取纾困政策能否提升企业发展预期。第(4)列以“企业发展预期”为被解释变量,将“纾困政策获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更高的压力水平并未显著转化为更高的补贴,但政府补贴本身具备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的作用。这一结果反映出政策落地的精准性与企业补贴申请的有效性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基于此,假说1b未能得到验证。

变量	(1)	(2)	(3)	(4)
	不公平感知	企业发展预期	纾困政策获取	企业发展预期
多重压力感知	0.034** (0.015)		-0.022 (0.155)	
发展环境不公平		-0.218*** (0.030)		
纾困政策获取				0.005** (0.002)
伪 R <sup>2</sup> /R <sup>2</sup>	0.009	0.018	0.011	0.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061	21061	20250	20250

对比两条机制的检验结果可知,多重压力感知主要通过不公平感知的抑制效应而非基于纾困政策获取的促进效应影响企业发展预期。换言之,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预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诱发企业对发展环境的负面评价这一心理认知渠道传导,而非物质性政策支持。尽管政策出台的初衷是提振企业信心,但其实际效果尚未充分显现。这表明稳定企业预期的关键在于构建公平、透明以及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 (五)进一步讨论

从现实情境来看,企业发展预期受到多重压力源的复合影响,这些压力源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企业压力感知对关键经营领域发展预期的差异化影响。本文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核心预期维度:投资预期、用工预期、市场预期、业绩预期和出口预期。具体而言,根据问卷中的问题“您预计未来一年内,贵企业的国内投资额”衡量投资预期情况,将选项“会减少”设为1,将“会增加”“大体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设为0;根据“您认为贵企业2021年用工量会同比增长、持平或下降?”度量用工预期,将选项“下降”设为1,将选项“增长”和“持平”设为0;根据“您认为2021年市场需求会同比增长、持平或下降?”度量市场预期,将选项“下降”设为1,将选项“增长”和“持平”设为0;根据“您认为贵企业2021年营收会同比增长、持平或下降?”度量业绩预期,将选项“下降”设为1,将选项“增长”和“持平”设为0;根据“与今年相比,您预计2021年的出口额情况会如何?”度量出口预期,将选项“会减少”设为1,将“会增加”“大体持平”“无出口”和“不好说”设为0。

表7报告了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多维发展预期的回归结果。由第(1)~(5)列的估计系数可知,多重压力感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预期、用工预期、市场预期、业绩预期和出口预期。原因可能在于,多重压力感知促使企业采取“防御性收缩”策略。一方面,企业倾向于推迟扩张计划、减少招聘规模以及缩减市场投资和海外订单,以规避风险并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这种保守策略虽能控制短期风险,但会削弱人力资源储备、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化能力,进而降低收入增长潜力,导致业绩预期趋于保守。因此,多重压力感知通过影响投资、用工、市场、业绩和出口等维度,显著抑制了企业发展预期。上述结果表明,稳定企业预期的关键在于系统性缓解压力源,为企业创造更稳定的发展环境。

表 7 进一步讨论:多重压力感知对企业多维发展预期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投资预期	用工预期	市场预期	业绩预期	出口预期
多重压力感知	0.091*** (0.022)	0.104*** (0.026)	0.070*** (0.022)	0.076*** (0.016)	0.235*** (0.023)
伪 R <sup>2</sup>	0.021	0.030	0.019	0.029	0.0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061	21061	21061	21061	21061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多重压力感知如何传导至企业发展预期,并揭示了其内在的结构性特征与传导渠道。研究发现:企业多重压力感知显著抑制其发展预期,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现金流、税费负担及社保成本等关乎企业存续的“生存型压力”,而核心技术获取、高端人才短缺的“发展型压力”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压力主要通过放大企业对发展环境的“不公平感知”来侵蚀信心,而直接的纾困政策获取对预期的提振效果有限,这为竞争中视角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主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感知显著加剧了压力的负向冲击,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则能有效对冲外部压力冲击。本文研究为当前如何精准施策以稳定民营经济信心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宏观政策协同框架,实现从“应急纾困”向“环境营造”的政策重心转移。本文研究表明,真正动摇企业家信心的是关乎企业存续的“生存型压力”,且其主要通过放大不公平感知这一渠道发挥作用。因此,单纯依赖短期、物质性的应急纾困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预期。未来可以从多渠道增强事前的政策协同。一是建立跨部门的政策影响评估机制,在财税、金融、产业、环保等领域的新政策出台前,进行系统性的交叉影响评估,重点考量对民营企业现金流、综合成本和制度环境公平性的潜在冲击;二是完善优惠政策管理机制,针对近年来已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举措,建立健全备案审查、定期评估和期满退出机制,同时清理并规范地方性保护或歧视性政策,保障宏观政策取向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第二,深入推进竞争中性原则的落地实施,以制度公平提振企业家的长期发展信心。制度信任是企业家信心的“压舱石”,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则是稳定预期的治本之策。因此,必须将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置于经济工作的核心位置。在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方面,一是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全面清理对民营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不合理限制;二是建立常态化的民营企业诉求响应和处理机制,重点关注经营要素获取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核心诉求,切实保障企业的公平竞争权益。在保障政策执行公平性方面,一是强化对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能够惠及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二是建立涉企政策快速办理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目标企业,并实现政策红利的自动兑现,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和寻租空间,从而提升企业的政策获得感和对制度环境的信任感。

第三,构建前瞻性的微观监测体系,实现对经济收缩风险的早期预警与精准干预。本文的核心发现揭示了一条清晰的传导路径:企业层面的多重压力,特别是关乎日常运营的生存型压力,会直接导致投资、用工和出口等关键经营维度的全面收缩。在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应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与成因并重,重点纳入两类前瞻性指标。一是微观压力源指标。应超越笼统的景气指数,建立对企业核心痛点的高频追踪机制;二是经营意向性指标。需将企业的未来经营计划视为与已发生行为同等重要的监测对象,以提升政策的传导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 注释:

①2021—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持续强调“加强预期引导”“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等重要方针,在此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协同发力,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助企纾困、激发活力的政策举措。

②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3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告组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尽管2023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的资金规模超过2.2万亿元,但企业成本水平仍呈整体上升趋势,其中2021—2023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的成本水平及其增幅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企业。

③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是目前国内最早开始、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之一,是了解和评估我国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家动态和历史趋势的重要数据库。

### 参考文献:

[1] 刘尚希,傅志华,程瑜等.风险成本观下企业的成本变动和预期改善路径——2023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

告[J].财政研究,2024(3):33-50.

[2] 万海远,张尉,陈基平等.税收政策支持与企业预期转变[J].经济研究,2024(4):24-42.

[3] 崔小勇,蔡昉,卢国军.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否促进企业吸纳就业?——来自2019年试行留抵退税制度的证据[J].管理世界,2023(9):15-38.

[4] Hobfoll, S.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3): 513-524.

[5] 严兵,齐凡.贸易摩擦、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研发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24(3):107-119.

[6] 刘星,鲁施雨,凌核,等.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管理层感知视角[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5,45(11):3671-3691.

[7] Chen, P.F., Lee, C.C., Zeng, J.H.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irm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US Market[J]. *Applied Economics*, 2019, 51(31): 3423-3435.

[8] Liu, Q., Ma, H.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127: 103387.

[9] 张成思,孙宇辰,阮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货币政策感知与实业投资[J].财贸经济,2023(7):75-90.

[10] 吴晓波,许宏敏,杜朕安,等.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高管连带的调节作用[J].管理工程学报,2019(4):216-225.

[11] 陈志红,李健.环境不确定性感知、跨界行为与团队创新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20(6):40-48.

[12] 张骁,李欣.企业家全球竞争压力感知与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的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5):74-84.

[13] 李延喜,刘斌.管理者经营风险感知对公司极端现金流风险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双层面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5(1):113-124.

[14] 李颖明,王子彤,汪明月.压力感知与社会资本对企业高水平污染治理的促进效应研究——基于组态视角[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12):1-21.

[15] 杨兵,杨杨.企业家市场预期能否激发税收激励的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20(6):35-50.

[16] 蒋樟生.市场预期对制造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构关注和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11):57-69.

[17] Kang, W., Lee, K., Ratti, R.A.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irm-level Investment[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4, 39: 42-53.

[18] 陈东,陈爱贞,刘志彪.重大风险预期、企业投资与对冲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21(2):174-192.

[19] Enders, Z., Hünnekes, F., Müller, G. Monetary Policy Announcements and Expectations: Evidence from German Firm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9, 108: 45-63.

[20] Cicatiello, L., Simone, E.D., Ercolano, S., et a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scal Transparency on FDI Inflows[J].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2021, 73: 100892.

[21] 武威.政府采购“稳预期”政策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基于公共风险分析视角[J].财政研究,2022(7):66-80.

[22] Andrade, P., Coibion, O., Gautier, E., et al. No Firm is an Island? How Industry Conditions Shape Firms' Expectation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2, 125: 40-56.

[23] 刘洪愧.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预期改善[J].财贸经济,2025(2):34-51.

[24] 张雪兰,吴蓉蓉,何德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货币政策产出效应[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1):71-84.

[25] Lazarus, R.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M].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19.

[26] Huang, R.J., Miao, J.C.Y., Tzeng, L.Y. Does Mortality Improvement Increase Equity Risk Premiums? A Risk Perceptio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13, 22: 67-77.

[27] 余菁.竞争中性原则的政策应用[J].求是学刊,2020(2):85-94.

[28] Boneva, L., Cloyne, J., Weale, M., et al. Firms' Price, Cost and Activity Expectations: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Get Access Arrow[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0, 627(130): 555-586.

[29] 吕鹏,黄送钦.环境规制压力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吗[J].南开管理评论,2021(4):116-129.

[30] 马骏,罗衡军,肖宵.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企业创新投入[J].南开管理评论,2019(2):142-154.

[31] 孙明,吕鹏.政治吸纳与民营企业家的改革信心:基于中介效应和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

## Multiple Pressure Perceptions and Shifts in Corporate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 A Competitive Neutrality Perspective

MAO Defeng<sup>1</sup> PENG Fei<sup>2</sup> WEI Shengmin<sup>3,4</sup>

*(1.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3.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Beijing 100142, China ;4.Institute of Taxation Science, Guangdong Provincial Tax Service of the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510655, 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have shown a weakening trend that has constraine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horough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by which multiple pressure perceptions determine the expecte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ve neutrality, utilizing the 2020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CPES) data.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nterprises' multi-pressure perceptions significantly inhibit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Among them,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urvival pressures such as cash flow, salary payment, and taxes and fee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while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 pressures such as core component supply and tal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business owner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pressure perceptions, and this perception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ir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However,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this inhibitory effect.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ressure perception mainly inhibits business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by exacerbating the unfairness percep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rather than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relief policies to achieve a promoting effect. This study not on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orporate expectations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ressure perceptions operate but also offer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Key words:** Pressure Perceptions;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Unfairness Perceptions; Competitive Neutrality; Relief Policy

(责任编辑:郭 策)